

华西坝民主文化的风云

金开泰

1938年考入金陵大学社会系。1944年毕业后，在金陵大学哲学系任助教的谢（道炉）韬，在校期间1944年夏参加“民主青年协进会”，并任宣传部长。积极投身于“国事报告会”，声援“市中事件”、纪念五四烛光晚会等活动。几十年之后他在为《风过华西坝》的题词中写道：“我在华西坝度过了难忘的八年，那时的华西坝充当了中西方文化的结合点，培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可见华西坝上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民主自由是文明的一大进步

华西协合大学一建立，在培养人才上就实行了一系列新的内容，除了中国传统的文科外，设置了许多自然科学的基础和专业学科，增进科学精神，造就实用型人才。在向中国政府立案的过程中，接受并践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华西坝上最早由校方直接宣讲民主的或许是1927年张凌高校长为总理逝世二周年演说《三民主义》。他介绍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三民主义的历史背景及其来源、三民主义之功用。在民主主义方面，阐述了总理留学欧西有年，于西方民主政治中，择取了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主义，法国卢梭之民约论。看到了欧美有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英人争选举运动等等的民主政治，涌于实现。反观内政，则异族专横，民权凋敝，故而思改善，而独创五权宪制。并以政权与治权联络的精神，实施五权宪制。此总理在民权主义中，将政权与治权分为二部，主张人民享有……于立法、司法、行政等下三权外，更加考试、监察两权，淘汰政界不良分子，以期达到选贤任能的目的。政治方可走上轨道，民权方能实施应用。完成全民政治，民权主义的工作，实施以后，务使人民均有政治的训练，能自由运用他个人的权利，而后乃能完成全民政治的方略。(1)

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各种层面上的公共事务，由这个层面上代表不同利益和诉求的人，经过充分的协商讨论，达成一致行为的规范。民主和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下诞生的一对双生子，是不可分割的天赋人权。没有自由就不会有民主，而没有民主也就不会有自由。在西方民主自由下成长起来的外籍教师，也在校中努力宣传和倡导民主自由。如刘延龄著张绍英译：“教育是一种危险物”，强

调：一个真实的大学，必须是一个古今世界知识荟萃的地方，里面有各国的文化，各民族的贡献，各种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学生可以利用一切历史上的典章文物，在那里是教学生在人类所抱负的领域中如何思想，如何选择，如何评价，如何创造。设若大学不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就不能够从它的学校中引导出什么来，它就不能够教育什么。一个大学生必须有完全的学术自由，他一定要有充分的自由做上面所提到的事，他不需得把他的教学拿来迎合任何社会政治等的要求，他必须要百分之百的自由才够的。如果任何国家，任何政党想要限制它的自由，那就使教育成为一种危险物。（2）

抗日救亡时期校中的民主管理

民主运动总是与时代合拍，华大和其他迁到坝上的私立大学在建立时期，皆是按西方私立大学的管理原则，实行董事会和理事会（后称校务委员会）和校长制，努力践行民主管理制度。华大立案后中国人在董事会中要占半数。华大董事会由纽约的托事部请托下列各团体代表组成，协合团体教会代表 15 人，差会代表 8 人，毕业同学代表 4 人（由本校毕业生全体票选，内中应有女代表），特约会员（本会可特约富有学识经验和社会影响并给本校有相当赞助者为特约会员）至多不得超过 4 人，校长为当然会员，但无选举权。主要任务是“对本校各学院、各学系负财务上的责任，保持其现状以及以后的发展与设施”；“有与纽约托事部和华西教会商定关于捐款及派遣教职员之权”，“有选举校长和改选校长之权”等。校务委员会“由全体教授选出代表若干人及校长、校务长、各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组织之，校长为主席。”其任务是“处理本校一切教务和行政事宜，并审查各院、各系和各委员会的文件”。

1937、38 年华大校刊上有许多校告，摘要刊载了校务会议和校行政委员会开会的记录。如 1937 年 9 月 6 日的校务会议，出席者：刘延龄，安得胜夫妇，杨济灵，张孝礼，张明俊，德乐尔教士，邓光禄，张凌高，杜奉符，戴谦和，冯大然，胡正德教士，方叔轩，葛维汉，华显达，高毓灵，启真道，李兴隆，林则，刘黎仙，孟克明，吉士道 庞石帚，徐维理，沈嗣庄，司马烈，陈普仪，唐波激，郑德坤 旁听：甘如醴，柯理尔，戴谦和夫人，全民乐夫妇，吴国璋 主席：张凌高 记录：郑德坤 讨论事项为：

（一）选举教职员 表决：选派郑德坤为中文书记，孟克明为西文书记。

- (二) 文学院院长案：文学院院务会议及行政会议推举司马烈为文学院院长。
表决：选派司马烈为文学院院长。
- (三) 教育学系案：读行政会议记录，刘之介请假一年，在教育厅服务照准案并通过。
- (四) 寄读生及转学生案：表决：将此案交行政委员会全权处理。
- (五) 组织救护队案：校长报告奉 中央政府命令将医学院全体学生及中国教职员组成救护队以便在本省服务或往任何地方工作。
- (六) 欢迎金陵大学案 1、读行政会议记录关于在此非常时期金陵大学拟移成都开课，并请求与本大学合作的议决案；2、产业委员会报告关于校舍预备问题。表决：1、以十分诚意欢迎金陵大学，并对陈校长八月二十八日电，表示欢迎合作；2、金陵大学师生住宿及其他问题，交由行政委员会全权处理。
- (七) 基金案：各舍长提议征收基金问题。表决：根据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决案，“关于基金之设施，应在本届简章公布。” (3)

1938 年校刊上行政委员会讨论的四十项摘要。在教育部补助款之分配案中接读医学院及理学院关于补助款分配的最后报告。表决请医学院将营养研究所需的 1000 元预备一较详细的预算交本会审定，并将该项归入生物化学类名下。表决通过各学院所预备的预算。文学院 4000 元，理学院 8000 元，医牙学院 18000 元。在奖学金案中 通过了本年度承受各奖学金的学生姓名。(4)

可见在学校管理中，包括人员安排，校中要办的事项，皆拿出集体讨论，以表决做出决定，并借校刊公之于众。

校中的各类组织，如学生自治会，系会、级会，毕业同学会，科学会、宿舍管理委员会、伙食管理委员等一经成立，都可以按章程实行选举，独立开展自己的工作，尤其对学生最切身的伙食工作，完全由学生自己管理与监督。教会学校有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学生参加各种组织或活动完全由自己选择。

国民党虽在各校也设有区党部，发展了学校校长、教务长、训导长等为党员，但对学校的决策与行政起不到决定作用。三青团在学校中也设立了直属团部，下设区分队。通常要拉拢一些知名教授帮助撑持门面，方叔轩曾作过主任，周少梧长期任书记。同时与学校的训导、学生生活指导结合，发展团员和开展

活动。1943年10月“青年馆”落成，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三青团的活动虽然对学生团体有时有一些干扰，但也不能在各团体中起到决定作用。方威廉在谈到国民党和三青团对学校的影响时说：国民党对所有学校师生都进行严厉监视。国民党鼓动学生参加三青团，但并不成功。对于老师也要加入国民党，但参加不是强迫性的，只有一小部分人入党。基督教大学校长只有很少几位是国民党员，而且只是名义上的党员。由于国民党推行严厉的思想控制，甚至在班里安插特别人员，使师生对国民党更加疏远。（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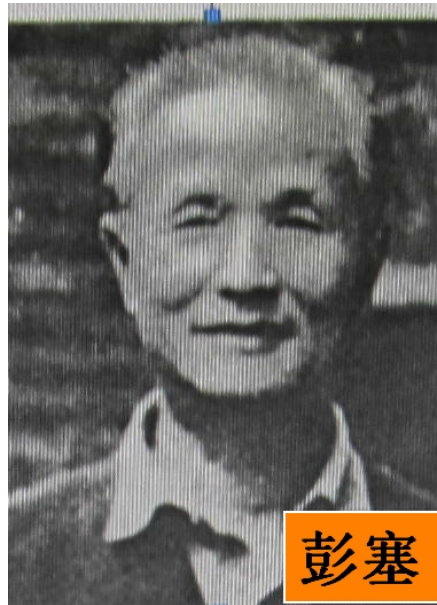
1937年西安事变后，形成了国共合作的全民族共同抗战的新局面，华西坝上的民主运动与抗日救亡融为一体。共产党也在1938年4月由沈荫家、艾尔达和金女大周曼如等建立了党支部，由省工委韩天石、张文澄领导。随着发展党员后建立了华大、齐大，中大，金大、金女大三个支部，1939年9月建立了五大学党总支，艾尔达任书记，接受中共外南区委领导，下设四个支部，在抗日救亡和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10月建立了抗敌救援分会，致电政府“誓做抗敌后盾，任何牺牲皆可弗辞”，组织宣传队，到城乡宣传；1938年抗日学生救亡剧团到新繁宣传；五大学学生抗敌宣传第三团、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等；开展募集寒衣、捐献、慰劳、义卖、义演献金等；1938年五大学组织乡村服务团，到温江服务；1938年武汉失守五大学组织了战时服务团，邀请冯玉祥来校演讲，组织防护大队，抢救空袭受伤人员等。

新一轮的民主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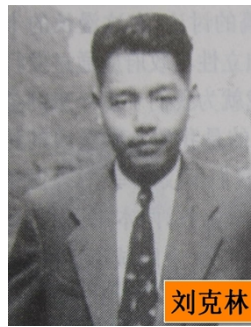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后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激变化，国民党的独裁、贪污腐败及战事的失利，激起了国内民众的强烈反感。而在延安的共产党经过战时的发展，已占有了陕甘宁边区和15个抗日根据地等大片土地，并开展轰轰烈烈的选举，民主生活耀人世眼；又拥有可编六个军18个师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局部反攻；在国统区有地下组织，亦有开展城市工作的力量。华西坝上各校学生共产党员，利用学校较宽松的环境，自由结成团契的条件，积极活动，发展和壮大组织，掀起了新一轮的民主运动高潮。

1944年2月21日，周恩来发表谈话，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四月汤恩伯丢了河南，学生中有人帖出大公报“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1942年夏奉南方局之命考入哲史系的中共党员贾唯英和1941年暑考入华

大哲史系胡文新决定，争取民主要由隐蔽转到开展斗争。于是找到了哲学系读研究生的共产党员彭塞和学生刘盛舆，四人共同发起组织了学校的第一个公开的进步团体——“时事研究会”，由彭塞出面登记，以剪报加按语揭露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放在办公楼前面的十字路口。随后又不定期举行时事报告会，首次请了大公报主笔王芸生演讲，效果很好。(6)



1944年9月燕大刘克林邀华大贾唯英，发起组织了“未名团契”，（纪念鲁迅的“未名社”和不忘燕大未名湖），请燕大教授、教务长沈体兰作顾问。在新都桂湖召开成立大会，第一个议程是宣誓，大意是“我们宣誓：我们要象兄弟姐妹般的亲爱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关心，我们要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抗战的胜利而献身，我们要为消除社会的不平、黑暗、专制，争取自由、民主、正义和光明的未来而奋斗不息。……”第二是确定团内排行，从大哥到13弟，大姐到13妹，王守文拈到大哥，李肇基二哥，贾唯英三哥，严庆澍三姐……26个兄弟姐妹，它是华西第一个进步团契，后来发展为成都市学运中的骨干团契，开展了许多进步活动，如以赵超构写的《延安一月》为启蒙读物；市中事件后组织慰问受伤学生；举办反法西斯胜利图片展；选举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追悼昆明死难烈士；阅读〈论联合政府〉等。随后相继成立的有“星星”、“协辉”等七、八个团契。受到南方局组织部长于江震的赞扬。(7)



1941年考入华大哲史系学生共产党员刘盛舆，1942年秋和同时考入金大的共产党员赵鲁光联系了一些认识的，失去关系党员和进步同学，暑期组成“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随后扩大到坝上五大学，及四川大学等，定我为“中国青年民主协会”。(8)

1944年10月4日由“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的秘密小组发起，“时事研究会”等七个学术团体联合在体育馆召开了“国是座谈会”，请民主同盟张澜、青年党李璜、常燕生、国民党黄健中、无党派邵从恩、吴贻芳等参加，张澜第一个发表演讲，“与在大难当头，有亡国的危险，救国的办法就是废止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实行民主政治，组织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结束时喊出了“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会议开得很成功，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评价。(9)

1944年10月15日由“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的秘密小组发起在文殊院研究成立民协的会议。华大的贾唯英、刘盛舆、彭塞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川大黄寿金主持。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1、宣布成立一个进步青年的统一组织，定名为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2、协会的任务是团结青年学生，开展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3、到会同学为当然成员，会后各自在本校建立组织，发展会员、开展活动；4、新的会员需两个以上会员介绍，干事会批准，方能入会；5、会员保守秘密。最后推举燕大王文星、川大黄寿金为总负责人。贾唯英回来后建立了华大的民协组织，发展了第一批会员。其他人也回各校发展会员。1945年初，她的党组织关系由南方局转到川康特委。川康特委成立了青年工作领导小组。派金大学生王宇光负责大学党的工作和民协工作，贾唯英为组员。两人于1946年5月结为夫妻。民协形成了第一个章程，改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协会”，领导社团80多个，会员发展到200多人。民协成立不久中共重建了党支部，到1949年共历11届，发展了党员20多人，民协的负责人多数由党支部书记兼任。(10)

10 月底发生警察毒打市中学生的事件，贾唯英 11 月 6 日参加了全市各大中学校代表会议，决定举行游行请愿，“金大六社”领衔起草“宣言”，提出了统一的斗争口号和要求：(1)严惩凶手方超，撤消余中英职务；(2)医治受伤学生，赔偿一切损失，向学生及家长道歉；(3)保障学生的人身自由，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4)严禁军警干涉学校行政。13 个代表向张群交了请愿书。11 日贾以自治会主席身份组织女同学参加请愿游行。华大贾唯英与燕大李中（慎之）、金大张微之代表各校去向省府陈辞，迫使张群答应了学生的要求，警察局长方超、市长余中英下台。



李慎之

1945 年五四青年节，108 个社团联合召开了几千人的营火晚会，反独裁，争民主，成立联合政府。华大吴宗耀、文幼章，川大李相符、彭迪先、燕大沈体兰、金女大陈中凡等的进步人士参加了，文学家叶圣陶也来了。文幼章在会上说“我尊敬孙中山先生，我是真三民主义的信徒，可是现在国民党当局奉行的是假三民主义，完全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学校特务横行霸道，无人敢问，今天下午，我就亲眼看见特务学生打散了一个纪念五四的集会，听说他们还要来冲今天晚上的营火会。我们几千人还怕他几个特务？我是不怕的，我的力气大，他们来了。我帮助你们打。你们怕不怕？”几千人一致回答。会后表演文艺节目，高举火炬走向街头。(11)

1946 年中共成立成都工作委员会，蒲华辅任书记，马识途任副书记，委员王宇光、贾唯英、华健，彭塞负责学生运动。彭塞以哲史系研究生，住华大，兼华大党支部书记。充分利用团契活动，并控制华大学生公社，订书刊阅读，组织报告会、讨论会等联系广大同学。1946 年沈崇事件发生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全市示威；组织了反饥饿、争生存、反迫害的斗争；办好伙食团、发动助学运动。

这种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青年学生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使更多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时在国统区为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扩大了群众基础，随着内战中的胜利，极大促进了共产党在全国有胜利。

燕大新闻系的学生高洁 50 年后在纪念燕大成都复校五十周年中写道：社团，尤其是团契在燕大起到了十分独特的作用。各种思潮、不同的政治观点，在这里自由发挥，充分施展，各自影响着来自南北东西，不同家庭环境的青年学生。年青人到这里学习、思考、成长，而后走上漫长的人生道路。我入校不久后，经先我半年入燕大的中学同学吴小静介绍，参加了未名团契。在这里我结识了一大批思想进步、执着追求真理，正义，爱好自由、民主的同志和朋友。未名团契除了发起人刘克林、贾唯英是中共地下党员，其余绝大多数都是些十七、八岁的毛孩子，半数以上是四川人，政治上比较闭塞，但都有一颗爱国心，有一腔推动中国走向富强不受欺凌的强烈愿望，共同的爱心和忧患意识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面对当时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复杂的政治环境，校中几十上百个团体，……校方从不干预，不强制学生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历次学生运动，罢课声援也好，上街流行也好，都是学生全体讨论，表决通过。这种民主自由的校风，加上时事政治教育，使身为教会学校的燕大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革命的中坚分子，造就了大批精干有为的人才。(12)

在这种民主运动中最难选择的是校长们。作为校长既要接受政府管理，更要保护学生，还要善于同政府沟通，反映学生的诉求，让政府方面避免产生暴力行动，而使学生受到伤害，如果有学生被拘押，校方还有责任营救他们。这些自然与校长的威望及在政府眼中的地位相联系的，有的人能做到，有的就难以两全。

金女大校长吴贻芳是敢于面对政府的代表。1948 年秋季，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展开了对开展民主运动的学生实行大搜捕。一天夜晚，吴贻芳听说自己有学生被列上了黑名单，便连夜赶去面见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严正地说道，我以吴贻芳担保，金女大没有你们要逮捕的人。为了女子大学的声誉，军警不得进入校园。尽管当时学校里有地下党的秘密组织在活动，但金女大没有一名学生被抓走。(13)

为了控制事态的发展，在事件发生之初，学校自然要通过行政劝阻学生参加，有的甚至关闭校门，不让学生出去，这同时也会遭到学生的反对，加剧学校与学生的对立。而齐鲁大学校长汤吉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被迫离校的。

1944年10月31日，成都发生了警察殴打市立中学学生的事件。事件发生后，成都市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群情激愤，引发了学潮。11月6日，民协成立“成都市各大、中学学生声援市中血案后援会”，组织市中学生到各大学去控诉，宣传鼓动，呼吁支援。华西坝五大学学生也决定参加11月11日的大游行，齐大校长汤吉禾的经历却又是另一番风味。其女汤婉华说：父亲没有让学生参加游行。学潮迫使当局被公开撤了成都市中校长康定夏的职，市长余中英、警察局长方超也被迫引咎辞职。事后，其他大学的学生都嘲笑齐大学生胆小怕事，这让齐大的学生觉得很没面子。他们便迁怒于我父亲。碰巧这时发生了学校开除一个学生，就成了“倒汤罢课运动的”导火线。掀起学生“反汤”，通过学生自治会进行罢课，举行声讨和“反汤”游行。当时学生提出“汤吉禾一日不走，一日不复课”的口号，还指控他克扣政府发给学生的膳食补助金。一些学生还把校长办公室的门堵死，不让校长来上班。还有一些学生给父亲画了漫画像并张贴在新南门。父亲在学潮一开始，即向校董会递交了辞呈，并要求派专员调查他是否克扣过学生的膳食补助金。当时校董会就派了沪江大学的美籍教授来彻查，结果查明是齐大的事务主任贪污，与父亲和总务长杜儒德没有丝毫关系。虽然已经查实了父亲并没有贪污，不过学生并不善罢干休，继续控告不停。在这种情况下，校董会召集特别会议，研讨此事。多数董事担心事态扩大，就决定请父亲休假，出国去与在英、美的齐鲁校董会共同商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学校复员问题。父亲于三月离开齐鲁大学。（14）

在民主与专制的搏斗中，追求民主十分艰巨，甚至异常残酷。人们在自由选择时，也伴随着极大的风险。华大哲学系优秀学生毛英才刚开始选择，读着一些不同的政治书籍，1949年6月14日她到小天竺“章身”裁缝店做衣服，一时疏忽，把装有《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书夹掉在店里，被老板发现告了密，次日晨遭特务逮捕。在狱中她一直坚贞不屈，坚持自己的清白，校方也出具清白的证明，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逃离成都前夕，下了血腥的“洗监”令，将她杀害于西门外十二桥，付出了年青的生命。在同时遇害的35位中年龄最小的，

又是唯一的女性。



在华大为她召开追悼会的礼堂内，哭声令人心碎。不少的悼唁诗文情深意切。文学院罗玉君教授有挽诗云：“花雨何如血雨红，梦醒华西夜半钟。我进课堂英才去，桥畔谁与品芙蓉。”（15）

民主总在曲折中发展

中国社会在漫长的专制社会中前进，民主和自由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中一蹴而就。反复是难以避免的。那些积极投身于民主运动中的人，也不可能人人一帆风顺。正如高洁在文章中所说：时光流逝，几十年岁月过去了，回顾这段历史，欣慰之余，心中不免有些沉重。主要是遗憾地看到当年为之呐喊，奋斗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某些历史的错误和不公正在惊人的重现，而我们的一些同窗好友已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了。我常想起刘克林，他在未名团契成立会上大呼：“……我们要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抗战的胜利而献身。我们要为消除社会的不平、黑暗、专制，争取自由、民主、正义和光明的未来而奋斗不息。……我们不做罗亭；我们要做英沙洛夫……”后来“竟然不明不白地惨死在‘文革’的混乱之中。像他这样枉死，屈死的冤魂又何止万千！这简直是千古历史的大错误，大悲剧！”（16）回顾历史，像刘克林这样的人的确不少。

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燕京新闻》的发行人的蒋荫恩。在成都恢复并指导了《燕京新闻》，为民主运动鼓与呼，文革中遭到残酷批斗，1968年4月6被迫害致死，最为令人发指的是遗体还被拖行示众，令人惨不忍睹。1944年夏参加“民主青年协进会”，并任宣传部长。积极投身于“国事报告会”，声援“市中事件”、纪念五四烛光晚会等活动的谢韬，1955年为胡风打抱不平，被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身陷文字狱。1960年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1942年到成都燕京大学复学，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曾在市中事件中任谈判代表的李中（慎之）1957年被钦定点名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华大地下党

重要成员的贾唯英 1957 年被划为“右派”， 1958 年 4 月，被下放到长寿湖农场“监督劳动”。整整三年，一千零九十五个日日夜夜，受尽了凌辱与煎熬。1966 年文化大革命 12 级台风又把她刮到大浪的峰尖上。在重庆大学广场，批判贾唯英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上，恶言恶语劈头盖脑而来。武斗期间，分配她去为死难者守灵，看守尸体。她也只好沉默地服从。军宣队、工宣队来了以后，又把她隔离起来，强要她交待自己是“打入共产党的国民党特务”。同为地下党员的华大研究生彭塞，1958 年 4 月反右要结束之时，受到了批判，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两级，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等。

好在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废除阶级斗争为纲，开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平反冤假错案中，都得到了平反，健在的人又在新时期为争取民主而不懈努力，其中不少人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值得铭记。



谢韬（二排左1）返蓉会见原华西坝上的老朋友

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也是人类追求的一种文明的政治制度，它涉及到从国家管理到各种层面的公共事务。民主和自由总是联结在一起的。在民主的体制下，人人都要树立独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为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而努力。如果长期的人云亦云，社会就谈不上进步。回顾华西坝上的民主文化，前贤都做出自己的努力和牺牲，值得后来者尊敬和发扬。

注：

- (1) 华大校刊 1927 年 4 月一期 5 页)
- (2) 1946 年 4 月 30 日六、七期合刊)
- (3) 华大校刊 1937 年一期；
- (4) 华大校刊 1938 年 1 月第三期；
- (5) 《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16 页
- (6) (7) (9) (10) (11) 《华西坝风云》贾唯英：回忆我在成都的斗争经历
- (8) 刘盛舆：回忆我的革命历程
- (12) (16) 纪念燕京大学成都复校五十周年纪念特刊高洁《未名团契与我》
- (13) 金陵女子大学校史
- (14) 汤婉华：我的父亲汤吉禾)
- (15) 《华西坝风云》：革命青年毛英才烈士